

访谈

达伦·贝勒
艾美莉亚·庞

此访谈用英文进行。感谢专业人士晓义将访谈以及达伦·贝勒著作的
节录译成中文

《后街》译者 谈维吾尔人的 被剥夺状态



达伦·贝勒



艾美莉亚·庞

编按：著名诗人、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帕尔哈提·吐尔逊 (Perhat Tursun)，是无数被中国当局消失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之一。他被判处了长达16年的监禁，目前正在地点不详的监狱里忍受着煎熬。在他的长篇小说《后街》里，他探究了一个在乌鲁木齐失踪的年轻维吾尔农民工所遭受的“非人化” (dehumanization) 过程。在两位合译者的协助下 (其中一位译者随后失踪)，《后街》的英文版于2022年在西方出版。

本刊编辑艾美莉亚·庞 (Amelia Pang, 以下简称庞)：最近找到《后街》的译者之一、研究维吾尔文化的著名学者达伦·贝勒 (Darren Byler, 以下简称贝勒)，就这本书的主题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以下对话经过编辑和压缩。此外，经贝勒先生授权，这里还发表其《恐怖资本主义：维吾尔人在中国城市遭遇的剥夺及其男性气质的养成》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一书第五章之节录。我们请读者自己去思考为什么增加这一部分内容。

庞：吐尔逊30多年前就动笔写这本书，到2015年完成定稿时，正赶上新疆再教育营大兴土木。你知道书中有哪些部分是他后来那几年加上去的吗？

贝勒:书中改动的地方不少。吐尔逊的英语不错,所以这整本书是我们一起翻译的。在他读译稿时,他说想增加一些场景。比如“劈,劈,劈”这一幕就是他后来加上去的,充分表达了对种族灭绝的愤慨。

【译者注:上述场景讲的是,书中的叙事者在街上碰到一个人,听到那人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劈,劈,劈...”。叙事者接着解释道: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会发现,在这个人的想象里,他每吐出一个‘劈’字,他都是在劈人…他口中的那些城市里至少有450万维吾尔人…也就是说他需要劈它9375天(才能把这些人杀光)。”】

贝勒:这个场景在维语版的这本书里是没有的。吐尔逊想让西方读者看到这一幕,想把维吾尔人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压抑的愤怒更清晰地表达出来。

庞:这是个富有冲击力的场景,它似乎有某种预知性。你觉得吐尔逊是否预见到了再教育营会朝着现在这个样子发展?

贝勒:我不知道他是否确切地预见到了再教育营,但他曾亲眼目睹过暴力。他很清楚这个国家有能力对维吾尔人施以各种暴行。每个维吾尔人都清楚这一点。我认为吐尔逊预感到了可能发生什么。例如,相应的物流会怎么运作?怎样才能把人通通杀光?

这本书的主题之一是主人公的“非人化”。他被贴上了害虫的标签,当他游离于城市的边缘、挣扎图存的时候,他身上就有了害虫的素质。我认为这

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要把平民大规模关进集中营，就需要将这部分人口进行种族化处理。而种族化，顾名思义，就是把他变成不足以称为人的东西。

庞：非人化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都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当局经常批评美国警察施暴和种族暴力问题（这些都是确实存在而又显著的问题），以此来转移针对其自身的批评。虽说没有多少可比性，但中国对深色皮肤的维吾尔人的“非人化”，与西方国家对有色人种的“非人化”之间显然存在某些类似的地方。

我认为维吾尔人和美国有色人种之间没有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是件令人伤感的事。但我认为这部小说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它如此生动地捕捉了一位处于系统性种族主义之下的深色皮肤的人所经受的暴力和非人化。很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

贝勒：我认为它能起到你所说的作用。我认为大多数读者会意识到，这部小说与后殖民主义（或去殖民主义）文学是相通的，而后殖民主义文学叙事的指向是殖民主义经验。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针对非洲裔美国人而施行的奴隶制及针对黑人的歧视法案（Jim Crow laws）的某些文学作品。

在一个殖民地体系中，所有的制度都是为殖民者服务的。这意味着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由殖民者控制——学校系统、银行系统、法律系统、刑事司法系统——所有这些系统的设计都是为了让安家落户的外来殖民者受益，而不是让殖民地的原住民受益。与殖民者相比，被视为“另类”而打入另册的原住民会感到格格不入和若有所失，这也是吐尔逊小说的主人公自始至终

的经历。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会被种族化。无论他表现得有多好，也无论他汉语说得多流利，他仍会被当成另类而种族化。这是一种不同于我们所知的欧洲和北美语境的种族化，但彼此是有关联的。我想可以说成是不同的序列吧。

有些人可能认识不到这种相似性，因为（海外）汉族人相对于白人来说也是被种族化了的。他们这样说也没有错。但既然这是全球性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清楚地看到，民族差异被中国的机构种族化了。这就产生出非常相似的动态。

庞：这个说法非常到位。尽管书中的维吾尔主人公在北京上的大学，但他永远都不是个地道的中国人。无论他普通话说得多流利，他还是处处不招人待见。这让我想起了我的表妹（及她的汉族母亲），她们不肯跟我家来往，因为我们有维吾尔族血统。他们以此为由不来我家里聚会。我们家事实上已经非常中国化——已经没人还会说维语了——但还是不行。

贝勒：这种种族化的存在真是可怕，它可以撕裂一家人。

庞：说点轻松的吧。书中有哪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句子？

贝勒：有很多。吐尔逊实际上是一个诗人。如果你问他的话，他可能会说他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小说家。他有一双诗意的眼睛，给他的字里行间渲染了一种情感色彩。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他描写乡下的童年，牧羊的生活点滴，以及他与那片土地的关系。

但对我最有冲击力的部分是，他的老板跟他说，他是整个民族之耻，而主人公意识到，他的终极力量在于他的生存能力。因为只要一息尚存，他就有巨大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存在激怒了他的老板。这是种非常有力的说法——也是对维吾尔人的认知很有冲击力的一点，即，他们只要活下去，就是强有力的。只要他们一直存在下去，他们就永远是强大的。

庞：在一个沉迷于数字和金钱的社会中，主人公在数字中把握更深的含义。而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他失去了理智。他迷恋的其中一个数字是10月份的第46天。这似乎是隐喻“六·四”和中国的国庆节。你认为在这些折磨着主人公的数字中，是否隐藏着更深的含义或政治表达？

贝勒：是有这种可能。吐尔逊可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而宁愿留给读者自己去解读。但他对数字、讽刺、语言游戏以及如何用语言游戏来同时传递多重含义有一种迷恋。我想如果读者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吐尔逊大概不会说是误读。

考虑到他的生平，有这样一种可能的解读。1989年六四那天他在北京，参加了示威活动。那确实是他的青年时代的形成阶段。如果他把这些经历嵌入到故事中，那我一点也不会惊讶。主人公的家里挂着一张脸上有痞子的人的画像，这说明他在思考国家对社会产生的威压。

庞：这个画像（可以说就是毛泽东画像）出现在这本书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场景中——这是有些政治风险的。这一细节是他原稿中本来就有的吗？还是后来为海外的读者加上去的？

贝勒:应该是原稿就有的。他是一个大胆、敢言的作家。墙上的画像俯视着他的父亲，他父亲又俯视着他。这个场景令父权制跃然纸上。

到了他动笔写这本小说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已经不必再挂毛泽东画像了。所以这个场景可以被解读为对文革和那个时期的批判。但是，一个维吾尔人对中国历史说三道四总是政治上敏感的，所以他那么写是有风险的。

庞:他既没有渲染，也没有回避维吾尔分裂主义者采取暴力的极个别事件。这些段落似乎为这些惨痛的事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你怎么看这几句话：“在街上随意捅人，这出于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怨恨。他们所捅的并不是特定的人，他们是在捅向这座拒绝了他们的爱的城市。对于有些人，这种怨恨纯粹出于一种压倒性的恐惧。”

贝勒:他在书里指涉的主要是国家和殖民体系。或许我们可以做一间接的解读，说殖民状况导致了维吾尔男性对酒精的依赖。（汉族）定居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来到南疆时，他们带来了酒和其他东西。这与其他殖民地的语境相似，即殖民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依赖性。

吐尔逊在故事中将焦点集中在殖民化和歧视上，但他也坦承人们为什么会以牙还牙。政治暴力和对压迫的各种政治反应随处可见。恐怖分子的概念诞生于1960年代的一个殖民时期，当时殖民者把反抗他们的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称为“恐怖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抗的对象从殖民军队转到了定居点的平民身上。

但这么定义就去除了殖民地人民反抗的正当性，误解了人们为什么要有那

样的反抗行为，它引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术语。在过去，人们曾惯于把美国原住民称为“野蛮人”，现在人们认识到这是一种有害的谈论人的方式。但“恐怖分子”目前仍然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术语。

避免使用“恐怖分子”这个词，并不是要否认暴力的发生。确切地说，所发生的确实是暴力犯罪，是仇恨犯罪。但人们实施暴力行为是其来有自的——如果想阻止暴力的发生，我们就需要了解其发生的原因。

阻止暴力发生的方式就是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即去奋起还击那些创造了怨恨和恐惧的种族主义结构。吐尔逊几句话就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我希望读者能看明白他在谈论暴力的时候要说的到底是什么。

庞：我认为这在书中是一目了然的。还有什么其它的要补充吗？

贝勒：吐尔逊并没有局限在维吾尔人世界里。在北京学中文时，他接触到了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比如莫言和那些朦胧派诗人的作品，那些用意象而非韵律写作的现代派诗人。他还拜其中一位诗人为师。这说明吐尔逊积极结交汉族同道，并将他们视为同胞。他与这些（汉族）艺术家惺惺相惜，他们也懂得他所承载的知识和价值。

庞：很高兴听你提到这一点，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维吾尔人和汉人可以彼此支持，共同治愈创伤。

很多像你这样为这本书出过力的朋友后来都失踪了——包括D.M.（即介绍你认识吐尔逊的人，不便披露真名），你的合译者，以及吐尔逊本人。你觉

得还有希望再见到他们吗？

贝勒：我希望如此。我希望能再相见。我们都不知道D.M.以及我的合译者目前身在何处。可能在再教育营，可能在工厂里强制劳动。更有可能的是被拘捕了。2018年我最后一次去维吾尔地区时，我打听过这些人的下落，但没人知道。

我希望情况有所改变。D.M.和我的合译者大致与我同龄甚至比我年轻。我40岁，所以说还来日方长。我希望二三十年后局势会有大的变化，他们也许可以离境。拿吐尔逊来说，他被判了这么长的刑期，如果还有刑满获释的一天，他也已经是60多岁了。很难预知将来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下面内容摘自达伦·贝勒《恐怖资本主义：维吾尔人在中国城市遭遇的剥夺及其男性气质的养成》(*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第五章 “次政治” (Minor Politics) 【节选】

陈焯（音译）是汉族人，祖籍安徽，从小随父母生长在新疆建设兵团——那是派驻北疆戈壁沙漠的中国老兵建设的准军事化农业殖民地。有那么十年的光景，他在乌鲁木齐附近的棚户区与维吾尔族迁徙者一起过冬。他目睹了孩子们的脸逐渐僵硬，最终麻木得一片空白起来。他说：“他们就像野草一样，在风中凌乱，然后逐渐长大，变得沉默寡言”。他为记录这些人所遭遇的剥夺而建立了大约30,000张图片档案，在浏览这些图片时，我深深感动于他为表达维吾尔人的颠沛流离所做的努力。陈焯说：“很多时候，

我无法捕捉到他们的形像”，“这些人历经难以想象的磨难，却发现自己的处境仍然极其暗淡”。正是在这种氛围中，陈焯开始探讨见证对他人的圈占和支配这方面的伦理问题，以及这种问题如何为一种新的草根政治创造条件。

拒绝贬值的草根政治

陈焯在山上的非正式定居点开始他的研究项目五年后，2009年7月5日，维吾尔族大学生走上了乌鲁木齐的街头，要求为维吾尔人的遇害（参见我第一章中对此的描述）伸张正义。与绝大多数跟我谈及这些事件的汉人不同，陈焯并没有将暴力事件归咎于维吾尔族、伊斯兰传统或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他并没有任何宽恕暴力之意，但他说他理解那种诱发暴力的挫折感和怨恨情绪。他曾惊恐地目睹汉族暴徒在他的公寓楼外殴打做烤馕的维族摊贩，而在暴力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警察只是在袖手旁观。

在紧接着的几年里，陈焯工作过的地区神速遭遇拆迁，当局在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建起了由混凝土网格和高层公寓楼组成的新建设施，这些公寓楼有自来水、照明灯和闭路安全摄像头。当然，维吾尔族移民大多得不到合法入住这些新居所需的文件，或者根本就无力支付。此外，在2014年实施新的便民卡制度时，有数十万搬进新居或继续住在非正式定居点的人被驱离。

正如陈焯所说的：

2009年7·5事件以来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首先，从表面上看，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旧式平房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公寓……基础设施得到了改

善,但对于那些受到重建最直接影响的人们来说,这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善。相反,他们发现自己被分散到城市的其他地方,或者被迫离开。第二,户口登记的条条框框大幅增加。维吾尔族迁徙者受到排挤。当他们出来找工作时,许多(迁居者)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自己盖起了房子,所以这就是当局提出的拆房理由。我真的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背后是一种态度,即认为维吾尔人“没文化”(因此不重要)。人们说得好像社会应该通过竞争来控制,好像有能力的人可以自由地生活在城市里,而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就应该被赶出去。当然,由于维吾尔人受到歧视,在中国社会里不能自由行动,不能随便说话,于是意味着他们会是首当其冲被淘汰的人。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整个新疆都应该被淘汰,因为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新疆本身就很“落后”。我真的不同意这种观点。它对我们在此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缺乏高瞻远瞩。把问题推到一边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别人,而不考虑自己在制造问题上扮演的角色。

许多身在新疆的汉族人将暴力归咎于抵触中国殖民计划的维吾尔人,陈烨则不是这样。他认为自己与颠沛流离的维吾尔族迁徙者站在一起。尽管陈烨能够获得“暂住证”,以合法身份在这个非户籍地城市生活,但他仍然认同维吾尔人的立场。一般城市人眼中的美好生活对他缺乏吸引力,他对那些没什么欲求,这不仅因为他知道这种成功将以维吾尔族的损失为代价,而且还因为他对通过消费建立人设不感兴趣。

陈烨住在一个混凝土的筒子楼里,地板上铺着白绿相间的瓷砖。四壁的书架上堆放着北岛和西川的诗歌,以及詹姆斯·鲍德温、兰斯顿·休斯、约翰·斯坦贝克和加里·斯奈德的中译本。在一旁的桌子上,在贴有标签的醋罐子上方,放着些维族风味的馕。在维吾尔人的传统中,干粮是不应浪费的

东西，吃剩风干的馕被掰成碎片，准备做天葬的祭品。有一次，我们坐在他的公寓里喝茶，他讲了一个关于维吾尔族朋友的故事。

我有一个阿克苏地区的（维吾尔族）朋友，他（几十年前）来到这里生活，但一直没能拿到身份证或户口。所以，2009年7月5日事件发生之后，当局试图把他赶回阿克苏，但他已经在这个城市呆了这么久了，他在阿克苏已经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没有人能正式承认他了，所以他是一个没法安置的人。尽管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他开玩笑说，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讲完这个故事时，他解嘲地笑了起来。对他来说，这个故事是新疆人一般生活的象征，包括汉族和维吾尔族（另见Bovingdon 2010）。虽然他清楚地认识到维吾尔族迁徙者所承受的被剥夺的痛苦，但他并不想追随中国的殖民计划。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没有可信赖的国度的人。

当陈烨和他的同道开始拍摄、将目光诚实地投向那些被中国殖民资本主义贬低的人们时，他们是在进行一种见证的实践。也就是说，在实际效果上，他们的实践产生了一种道德义务，即活成一个永久的见证者。在这种伦理主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Dave (2015) 认为，这种亲密关系不仅仅是自主主体 (autonomous subjects) 的会合，就像我们自律的现代主义社会的创始神话可能暗示的那样。与其说是出于自由的爱，不如说是苦难的他者正是通过其“不自由” (unfreedom) 而被带入相遇，活动家被迫向自身之外的伦理学投降。由于维吾尔族迁徙者依附于移民生活，而陈烨等艺术家拒绝脱离移民生活，所以他们都是走投无路的。他们一起同在其间，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当然，陈烨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因为他大可以安享作为

多数民族-种族的特权。然而，他拒绝了技术政治体系 (techno-political system) 的真理主张，并通过认同他所目睹的维吾尔人被剥夺的情况，站在了被视为是异见者的立场上，他这么做就等于接受了一种共同的不自由，从而导致了一种深刻的相互依存。

这种做见证的行为，对社会结构的正常编织产生了一种扭转或扭曲的现象。正如雅克·朗西耶 (Jacques Rancière) (2007) 所指出的，社区之间形成的政治团结是以共同情感 (shared attachments) 为中心的。这些围绕着一个共同对象的扭曲，打断了社会以公民身份或中国所适用的民族类别、户籍规范来进行的正常排序。朗西耶认为，当生活围绕着对某个标记 (例如，对新疆移民边缘性的共同情感) 的共同继承为中心时，它就处于正式政治结构的规范之外，它使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友谊和平等可以通过社会亲密感 (social intimacy) 和团结感来实现。这种政治重构的关键在于，它摆脱了自由主义政治的包容性，即并非旨在通过使“被排斥的部分” (excluded part) 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而使其正常化，而是开启了一种“任何人无论是谁” (anybody or whoever) 的政治 (Rancière 2007: 99)。通过这种方式，这一政治形式允许他人保持其差异。这样一来，他者被赋予了拒绝服从主权的能力。不仅如此，这个他者还被尊为知识的载体，被视为从见证、友谊和对生命的共同情感的实践中产生的政治感知 (political sensibilities) 的组成部分。

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使陈焯在乌鲁木齐的艺术家群体中广受尊重。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为维吾尔族人发声。其效果就是让汉族艺术家检视自己的特权、让维吾尔族艺术家在社区中感受到欢迎。然而，正如朗西耶所承认的那样，这种形式的政治很少能真正取得持久性的成功。要跳出规范的政治

是很难的；而社会结构的扭转要产生任何持久的效果则更难。虽然维吾尔族迁徙者一直在陈烨的脑海里，他们对他们的生活状况感同身受，并且他的拍摄对象越来越把他视为一伙，但维吾尔族和汉族观众有时很难领会他作品中的政治。

2015年6月6日，陈烨的一位朋友帮他举办了一场作品展。展地选在一家私人咖啡馆，而不是在国营的场所举行，以避免政审制度对展出作品的挑三拣四。陈烨在他的几个汉族艺术家朋友安排下，以布赖恩·埃诺（Brian Eno）的电影配乐《机场音乐》为背景音乐，放映了200多张图片组成的幻灯片。大约有100人前来观看，当中有许多是艺术家，其中一些人在中国主流当代艺术领域相当有名。我邀请了阿不力克木来观影，他即是我在上一章讲过的那个维吾尔族迁徙者故事的主人公。正如汉族主办的文化活动中普遍的情况，他是观众中唯一的维族人。演出结束后，我把阿不力克木介绍给陈烨。由于阿不力克木在过去几年中所经历的创伤，他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说汉语；陈烨也不愿意在观众面前说维语。由于这种相互间的难为情，他们很难彼此自由交谈。于是，我和其他观众用中文引导他们交谈。陈烨谈了一个小时，谈到他是如何开始他这个项目的，以及他从中结识的人们生活如何发生了改变。他谈到他很难阻止中国媒体为维吾尔人的生活挂上“笑脸”。他谈到，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他只是维吾尔族奋斗者的一个朋友和为他们发声的人。他为在这样一个小资环境中展示他的作品深感不安。

散场之后回家的路上，我问阿不力克木对这次交流有何看法。他举起手，把食指放在距大拇指约一英寸的地方，说：

他距离了解维吾尔人的真实情况就这么近了。也许他已经尽力接近了。每当汉族

人与维吾尔族人交谈时，总会有些东西在翻译中丢失。维吾尔人使用的词汇略有不同，而汉族人对他们所说的内容的理解也略有不同。汉族人用“老百姓”和“落后”这样的词来描述他们作为迁徙者的情况。一切都被翻译成中国社会的语言。事实上，维吾尔人并不这样想，也不经常这样说话。我们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我们不认为与中国社会相比我们是“落后”的，而“老百姓”这种说法好像我们都是平等的。也许我们说话的方式和汉族人说话的方式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他们也觉得有一些很大的区别。不过，我真正喜欢陈辉的地方是，他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某种英雄。他只是对摄影这样的事情有一些想法，然后他就去做了。他并不是要扬名立万，或做一番大事。他只是想看到生活的真实面貌。这一点上我真的对他肃然起敬。

他深深佩服陈辉的道德勇气，他发现他的摄影呈现出以往很少被展现出来的东西——深刻的悲伤。

我想知道为什么在他的镜头下，人们看起来都那么悲伤。其实人们往往挺开心的，即使他们的生活不那么好。

然而话说至此，他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这些影像的悲伤在于维吾尔族迁徙者的生活本身所面对的日益加剧的剥夺，以及使这种生活经历变得顺理成章的意味。

那些孩子，“迁徙者”（维吾尔语：musapir）的孩子，可能七天中只有两天是快乐的。他们的家庭已经以某种方式“精神崩溃”了（维吾尔语：rohi sunghan）。要么他们的父亲是个酒鬼，要么他们的父母为钱而一直在吵架，要么他们的母亲因为宗教上不够虔诚而被他们所属的群体

排斥，或者类似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当初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的原因。他们是想逃离家乡的宗教限制或贫穷之类的东西。但当然，他们把在农村的问题也带到了城市。所以那些孩子永远无法摆脱围困他们的愤怒和恐惧的感觉。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很悲伤。也许有些也源于陈烨拍摄的方式。他要抓拍的就是这样的时刻。

对阿不力克木来说，陈烨所说的“盲流”身份显然与维吾尔语中的“游走者”（musafir）有关。他也很清楚，导致他们来到这个城市首先是一系列的问题。他认识到，他们的精神已经“崩溃”。他们被人为地进行了一些处理，使他们成了这副模样。阿不力克木留意到他与陈烨在政治上有沟壑，这体现在他们各自立场的不可比性（incommensurability）——维吾尔人的所谓“游走者”和中国人的所谓“盲流”之间的不可比性。因为陈烨的形象是以中国人的立场呈现的，所以完全的去殖民主义政治（decolonial politics）是不可能的。正如阿不力克木所说：

汉族人看了这些图片会有什么收获？这些图片使问题变得非常清楚。他们把问题摆在你面前。但正如陈烨所说，他们可能只是把这些照片变成一系列由英雄摄影师拍摄的可爱孩子和“奇怪”人的照片。当然，这不是他想要的，他也不希望它导致某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作为制定某种新住房或教育政策的借口。你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你只能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你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看看农村的问题，看看新疆的深刻问题。你必须看到社会结构是如何造成这些破碎的家庭的，歧视是如何迫使人们像这样搬家找工作的，教育基础设施是如何阻止穷人找到真正的工作的，农村人的教育是如何不被社会所重视的。你必须看到人们的声音是如何被忽视的，人们是如何被当作动物对待的。

没有人知道2009年暴力事件的肇因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认为它是由一些集中的团体或其他什么组织干的。我认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许多人有很深的愤怒，但他们无法表达。许多人，比如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感到沮丧和无望。他们很容易被人利用了这种愤怒、被鼓动起来。但无论如何，2009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并没有针对性地解决真正的问题。这就像1989年或文化大革命一样，领导人只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安抚民心，说事情已经处理了，现在一切都很和谐。他们其实忽略了真正的问题，装作这些问题从未发生过。这是一种非常中国化的做事方式。我认为大多数汉族人也会这样看待陈焯的摄影。他们看到这样的人生活如此艰难，只是有点难过，但他们对此不会做任何事情。大多数人看到的影像人物，会认为（维吾尔人）是不愿意工作的坏人，或者可能参与了某种犯罪。但是他们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是社会本身拒绝了他们。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多选择（此处为我的强调）。

阿不力克木所指出的困难，是将草根政治转向更广泛的公众的难度。通过发展一种新形式的审美-政治重构 (aesthetic-political reframing) 来重新分配顺理成章的东西，这种企图不一定能让与他人相处 (being-with) 的亲密感在其产生的现场环境之外流通。相反，贫穷的形像和身为他者也可以被解读为“落后”的一个指标。它们甚至可以被解读为个体是暴力和贫困的原因，而不是结构性暴力和剥夺的结果的证据。然而，这些都是陈焯愿意抓住的机会。最后，见证创造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它自身的政治，无论它们多么微不足道。



用力摘橘的女人